

产业政策与金融：台湾地区发展经验^{*}

黄宗昊 林 冈

内容提要 后进国家或地区常藉由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但产业政策是否能有效执行,政治基础的支持与金融体系的配合至关重要。文章先由“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文献着手,梳理出产业、金融与政治三者的密切关系,再从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出发,说明公权力部门是如何运用金融体系推动产业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实行威权统治与金融管制,台湾地区当局遂能排除社会的干扰,将资金引导至计划发展之产业,从而主导了工业化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商业利益开始介入政策过程,企业取得资金的渠道也日渐多元,公权力部门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减弱,由主导逐渐转变为协调与配合的角色。

关键词 产业政策 金融管制 金融自由化 发展型国家理论

作者单位 1.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DOI:10.13516/j.cnki.wes.2015.09.011

一、前 言

在后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或公权力部门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成功的东亚地区,行政当局会规划与出台各式各样的“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扶植本地产业的成长。产业政策的内涵可以相当宽泛。按照史摩理等人(Cimoli等,2009)的看法,除了扶植本地“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所需的各式手段外,还可以涉及贸易、科学技术、公共采购、国外直接投资、智慧财产权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等方向。

行政当局是否能有效推动产业政策,金融体系的配合至关重要。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金永远是关键的稀缺资源。如何有效运用有限的资金并引入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更是行政当局主导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斯科波尔(Skocpol,1985)认为,政府是否能有效征集与分配金融资源,是为数不多但根本支撑起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广泛基础”(general underpinning),也是达成其他政策目标的前提。

本文拟从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出发,结合产业政策与金融两者,探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权力部门是如何运用金融体系推动产业政策,以致让台湾地区取得“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美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实行威权统治与金融管制,台湾地区当局遂能排除社会的干扰,将资金引导至计划发展之产业,从而主导了工业化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商业利益开始介入政策过程,企业取得资金的渠道也日渐多元,公权力部门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减弱,由主导逐渐转变为协调与配合的角色。

^{*} 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科研创新项目“台湾地区的政府体制、政治运作与政策产出: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启示”(项目编号:13QN16)的部分研究成果。

二、发展型政府、产业政策与金融

在解释东亚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强调政府作用的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始终位居主流^①。最早对东亚的发展型政府角色提出系统性观察的,首推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1982年的经典著作《通商产业省与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中的论述。藉由观察日本政府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如何引导经济发展,约翰逊(Johnson, 1982)归纳出日本模式的四个成分:首先,要有一批高素质的菁英官僚;其次,这批菁英官僚要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推动政策;第三,国家需采取“顺应市场”(market-conforming)的方式干预经济;最后,需要有一个如同通产省般主导经济发展的“领航组织”(pilot organization)。

从约翰逊的归纳已可看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雏形。他强调要由领航组织运用顺应市场的方式来干预经济,已明确指出有效推动产业政策对于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对产业政策的强调一以贯之地呈现在他的著作中,这可由他著作的副标题“产业政策的成长”(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清楚地看出。约翰逊也强调产业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有高素质的官僚菁英和推动政策的政治空间,亦即需要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支持产业政策,同时也要把政治稳定的考虑纳入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意涵之中。但另一方面,尽管约翰逊在著作中用了不少篇幅讨论日本的金融体系对产业政策与经济的作用,但他在总结归纳中却没有特别强调金融的作用。直到约翰逊在1987年的一篇论文中才明确指出金融,特别是金融管制(financial control)对发展型国家的重要性(Johnson, 1987)。

齐斯曼 John Zysman 在1983年的著作《政府、市场与增长》(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则弥补了约翰逊的不足,将金融体系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完整阐述。齐斯曼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金融体系,每一种对于产业发展都有特定意涵(Zysman, 1983):第一种是基于“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s)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运用竞争性的公开价格配置资源,使政府与产业之间保持距离;第二种则是以“信用贷款”为基础(credit-based)的金融体系。此体系由政府主导市场价格,促使政府介入产业的事务;第三种同样是以“信用贷款”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但其由金融机构主导市场价格使金融直接影响机构产业,并创造出一种可称之为“协商式”(negotiated style)的当代资本主义。

齐斯曼所区分的三种金融体系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时序密切相关。第一种金融体系属于最早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第二种和第三种都属于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国家有效促进产业发展的方案,日本的金融体系属于第二种。齐斯曼更明确指出,产业融资的选择性提供对于国家介入产业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信用贷款分配”(credit allocation)是特别有效的产业政策工具,理由有二:首先,政府虽然无法管控所有公司的所有决定,但由政府分配信用贷款可以确保发展的大方向与产业政策的有效推动相一致,同时这也是一种顺应市场经济的干预方式;其次,信用贷款分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干预方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弹性调整(Zysman, 1983)。

在约翰逊和齐斯曼研究的基础上,韦德(Robert Wade, 1990)的著作《管理市场》(Governing the Market)对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作了更细致的讨论。虽然在书中韦德也旁及日本与韩国的情形,但此本著作主要是他来台湾地区考察后的结晶。在本书最后的总结中,韦德洋洋洒洒地由台湾经验提炼出了经济成功发展的十项“处方”(prescription)并详加论述(Wade, 1990)。

这些处方包括:(1)用政策推动对产业的投资,特别要多投资在对未来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产业上;(2)运用保护手段,协助创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3)发展策略如果要倚重贸易,应强调“出口扩张”(export promotion)政策;(4)欢迎跨国企业投资,但要引导他们走向出口;(5)推动以银行为基础的

^① 严格说来,developmental state 应该译为“发展型政府”,指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国家作为大概念,实际上包括了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涵义。

金融体系,并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6)逐渐推动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并按部就班执行;(7)在中央层级设立“导航机构”或经济企划部门,以引导产业与贸易的未来发展;(8)在民主化之前,要发展出政治权威中有效率的行政机构;(9)在民主化的同时或之后要发展出“统合性制度”(corporatist institutions);(10)透过渐进改革创造一个合适的制度框架,以便能较佳地支持适度的产业政策。

韦德的十项处方如果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又可以将之区分为三大方面。前四项是有关产业政策的内容,除了政府应致力于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策略性产业外,还特别强调了出口导向贸易的重要性。第五项和第六项是产业政策的金融条件,政府要有效控制资金流向才能确保产业政策的落实。最后四项则是产业政策的政治基础,除了引领经济发展必备的中央层级导航机构外,还要确保政府在民主化之前的效率性,以及为民主化之后继续推动产业政策创造条件。

由以上的整理可看出,产业政策、金融与政治三者关系密切。后进国家常藉由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但产业政策是否能有效执行,政治基础的支持与金融条件的配合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政治基础、金融条件与产业政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构成本文的分析视角,用来检视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以下分别说明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原始型态,以及之后所产生的变化。

三、金融管制与行政当局主导工业化

1. 威权体制

国民党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台湾地区进行长达三十余年的威权统治。郑敦仁(Cheng, 1989)所提出的“准列宁式威权体制”(quasi-Leninist authoritarianism)是描绘台湾地区威权时期政治与社会的整合性观点。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建构起准列宁式体制,一方面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在各级公权力部门和军队均设立相对应的党组织加以严密监控。在社会中,除了国民党外,尚欠缺真正具有实力的全国性政治势力,国民党当局运用层层统合的方式控制各种社会团体。

为了实行统治,国民党政权运用“法统”体制排除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国民党宣称统治的合法性源于以往制定的根本大法,具有“法统”并“暂时”冻结了民意机关的改选。事实上,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来自国际承认,美国的支持又是其中的关键。“法统”体制要能有效运作,有赖于政治精英的族群区分,即将高层次和地方层次的政治精英按照族群加以区分。高层次的职位战后绝大多数为台湾地区的“外省人”所垄断,而地方公职则交给战前就居住在台湾地区的“本省人”,彼此之间很少流动(若林正文,1994)。

正因为有了“法统”体制与政治精英的族群区分,使国民党的统治集团和台湾社会保持距离,公权力部门得以维持高度的自主性。同时国民党所建构的准列宁式体制又能有效控制社会,赋予政府推动政策的必要能力。正如前文约翰逊所言,产业政策要能成功需让官僚有足够的政治空间以推动政策,而此条件在当时的台湾地区确已具备。

2. 金融管制

虽然国民党垄断了政治权力,但整个体制要能运作顺畅并真正具有自主性和能力,经济物质面的有力支撑是相当重要的。配合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经济面的政策指导原则主要有三:以充当统治工具的“官僚资本”作为经济运作重心;提供“经济租金”(rent)给体制的支持者;严密的经济管制,尤其是在金融方面。经济管制同时也是前二项原则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正因为经济管制,让官僚资本能够垄断经济中的关键部门,使国民党当局能够有效控制经济;也因为经济管制,使得藉由独占或寡占方式酬庸支持者成为可能(黄宗昊,2004)。

在威权时代,国民党当局采取高度的“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政策,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的家

数与业务范围,藉由控制金融业以掌握企业的资金流向,进而主导台湾经济的走向。企业的营运与发展需要资金,在外汇管制下,资金主要来自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和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台湾地区的资本市场从1962年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开始起步,发展未久,功能不强,因而企业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然而,设立银行须经特许,公权力部门并未开放民营银行设立,所以银行绝大多数是掌握在国民党当局手中的公营银行。企业为了避免丧失唯一的资金来源,唯有服从当局的指导。正如郑敦仁(Cheng, 1993)所言,威权时期的国民党政权是将金融视为经济的“发令高地”而加以守护(guard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按照前文齐斯曼的分类,台湾地区的金融体系和日本同属于第二类,但公权力部门对于金融体系的控制程度相较于日本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公权力部门要掌控产业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对金融工具实行强力控制,严密的金融管制已为台湾当局有效推动产业政策提供了支持条件。

3. 行政当局主导工业化

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产业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的阶段,行政当局扶植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食品加工业与纺织业,产品主要供应岛内所需,少部分用以外销。在当局各式的扶植手段中,贸易汇兑的相关政策尤其重要,藉由外汇管制、高关税、进口配额等手段保护本地产业,为生产创造诱因。与此同时,由于台湾地区欠缺资金,对工业化的融资很大一部份仰赖美国援助的资金(简称“美援”),且由当局分配、引导至重点发展的产业(谷蒲孝雄等,1992)。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的产业发展进入“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的阶段。战略转换主要是因为内需市场已经饱和,亟欲向外出口、寻求市场。此时产业的重心仍然是轻工业,但食品加工业与纺织业的比重下降,塑料制品、合成板等的出口有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利用台湾地区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行政当局于1965年开始设立“加工出口区”,各式组装业(特别是电子业)发展迅速,为台湾地区的出口赚进大量外汇。1960年出台的《奖励投资条例》是此阶段当局推动产业政策的具体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出口的租税优惠,同时给予来台设厂的海外资本与岛内资本相同的待遇,配合加工出口区的设立,改善投资环境对吸引外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隅谷三喜男等,1993)。

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高利率政策,民众在金融机构的储蓄不断增加,并逐渐取代“美援”成为支持岛内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为了引导高额储蓄转化为产业投资,台湾当局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重新开设了一批金融机构,并按照产业类赋予不同的政策任务。其中和产业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交通银行和中华开发公司,前者负责提供产业中长期贷款,后者则负责引介资金以填补“美援”减少后的缺口。在“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阶段,如同之前“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阶段,公权力部门不断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投入产业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进入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深化”并重的时期。“出口导向”的战略仍然持续,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也连带冲击了台湾的出口。而“出口导向”的战略让台湾的厂商都集中在产业的中下游,产业上游的原料依赖进口,成本高昂。结合以上两种情况考虑,台湾当局遂决定采取凯恩斯式的经济手段,在1973年出台了“十大建设”方案,藉由大规模公部门支出刺激经济景气。十大建设中除了有关交通、电力的七项基础建设之外,当局也宣示将筹办大炼钢厂、大造船厂与提升石油化学工业(简称“石化业”)的规模,这是台湾地区迈入产业上游与重工业化的里程碑。其中尤以石化业的发展最为重要,可说是推动产业政策、扶植策略性产业的核心。

从20世纪70年开始,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结余,外汇的结余为进一步的重工业建设提供

了部分的资金基础。为了调度庞大的建设经费,台湾地区当局于1973年设立“行政院开发基金”,并转移资金给交通银行和中华开发公司,作为扶植产业融资之用。如果以交通银行对产业的放款作为观察指标,在1965年与1970年时,得到贷款最多的都是纺织业,分别占33.69%和29.8%。但到了1972年,石化业得到的贷款已跃居首位,占27.55%,纺织业只剩下15.83%。直到1982年,石化业得到的贷款比例仍有14.29%,居所有产业的第三位(李孟翰,2003)。由以上信息可看出,台湾地区当局的产业战略藉由政策性银行的放款,确保了资金到位与政策的有效性。

四、金融自由化与行政当局主导角色弱化

1. 政治民主化

国民党能在台湾地区展开长达三十余年的威权统治和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开始改变其国际战略构想,积极拉近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以对抗苏联。这也对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造成冲击,使得凭借“法统”以排除大众政治参与的“正当性”明显下降。既然丧失了外部的正当性,国民党政权则以强化内部的正当性作为弥补,开放部分高层政治的空间,一方面让地方政治精英有机会参与高层次民意机构的改选,另一方面则松动了政治精英的族群区分,引进一些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中崭露头角的本省籍精英担任党、政要职(若林正丈,1994)。此种“非制度性的个别笼络”策略一开始有用,但效果也随着时间而递减。

特别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登场,要求民主化的呼声甚嚣尘上,迫使国民党政权逐渐在政治上进行实质性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民主进步党的成立、解除戒严、“立法院”全面改选等事件的发生,使台湾地区朝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特别是1992年高层次民意机构的全面改选以及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标志着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在制度上已然到位。

随着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控制社会的强政党体制也逐步消退,不间断的选举更提供了地方势力与资本家介入公权力部门决策的方便管道。企业以往面对当局时都只能听令行事,现在则可利用各式参与政治的机会,要求当局出台政策与采取作为以照顾其利益,因而公权力部门推动政策的自主性与能力相较于以前都大幅下降。既然以往支撑起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政治基础逐渐减弱,公权力部门在产业发展的主导性角色势必面临调整。

2. 金融自由化

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对经济的严密控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解除,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压力使然,其中尤以美国的态度为关键。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不景气,其中又以美国贸易收支恶化最为严重。在这样的局势下,台湾地区的“出口扩张”以及对美国的高额贸易顺差自然成为美方关注的焦点。自1979年起美国每年与台湾地区展开贸易谈判,要求放宽对进口产品的各项限制并调降关税;自1986年开始美国要求台湾地区放松在汇率政策上的严密管制,让新台币升值以反映经济实力(段承璞等,1992)。

随着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本逐步累积,但国民党当局实施金融管制,多余的资金既无法汇出国外又无法被银行完全吸纳。这造成游资充斥并大量投入股市与房地产的炒作,导致严重的泡沫经济与金融失序。

在国际压力与本地失序的冲击下,台湾地区的金融管制逐步放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废除利率管制、外汇集中管理,开放贸易及服务的外汇限制,重新开放证券商设立。而解禁的最高潮则是1989年修正《银行法》,开放设立银行。包括利率、汇率、证券、银行等项目在内的“金融自由

化”对台湾地区的政治与经济都带来深远的影响。最关键的影响之一即是企业取得资金的管道多元化,公权力部门无法再藉由垄断融资渠道主导产业发展,构成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金融条件已然丧失。

3. 行政当局主导角色弱化

在政治民主化与金融自由化开始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已展开“产业升级”的工作。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台湾地区制成品输出美国受到冲击,连带也影响到上游原料供应的石化业。同时岛内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兴起,高污染的石化业常成为社会运动的抗争对象。这些内外情势的变迁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被当局大力扶持的石化业无以为继。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行政当局想重新塑造下一阶段的战略性产业部门,并以低污染、省能源、技术密集、高附加价值等原则,最终信息电子产业(电子业)雀屏中选,成为大力扶植的新核心(谷蒲孝雄等,1992)。这也是台湾当局强势产业政策的最后代表作。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重点扶植的是电子业中的半导体产业,除了运用租税优惠与投资促进的传统手段外,为了配合电子业技术密集、着重研发的产业特性,尚有两项关键手段:其一是1980年设立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并运用非常弹性的方式加以管理,达成了规模经济的效果。其二是运用官方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研院”)进行研发,再将技术转移给园区内的厂商,有效克服了产业初期研发创新不足的瓶颈。

在产业政策引导下,金融资源也大量挹注。“行政院开发基金”大量投资园区内的厂商,直到1997年,25项投资案中半导体业还占有5项以及40.57%的投资金额。交通银行也配合开发基金的运作,从1982年5月到1990年12月,核准的“战略性工业中长期低利贷款”、“战略性投资计划优惠贷款”共达2175件,金额约1182亿新台币,其中电子业就拿到246亿新台币,占总金额的20.8%,是所有产业中最多的。在行政当局全方位的扶植下,电子业表现果然亮眼,大量外销以及高速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台湾地区产业的中流砥柱(李孟翰,2003)。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民主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开展,行政当局主导产业发展的角色逐渐弱化。最明显的改变之一即是1991年出台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取代了行之多年的《奖励投资条例》。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行政当局以往对产业选择性扶植的作法逐渐被一般性奖励的方式取代。以往当局通常是针对特定产业(例如电子业)给予各式优惠以扶植其发展,自1991年以后将逐步调整为针对有助产业升级的活动(例如研发、人才培养等)给予补助与奖励,并不限于特定产业。在资源分散之下,当局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自然大不如前。

在金融自由化之后,企业取得资金的渠道开始多元化,可以向民营银行融资而不用像以往只能向公营银行借贷。企业除了向金融机构融资之外,还可以藉由发行股票、公司债直接在证券市场集资。尤有甚者,企业取得资金的渠道不止多元化,更进一步全球化了。企业可藉由各式金融工具,例如向海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 GDR)、“美国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ADR)、以外币计价的“可转换公司债”(Convertible Bond, CB)等在全球募集资金。例如台湾地区的企业发行GDR和ADR,1991~2005年累积已达157件,募集资金305亿美元,在海外发行CB截至2005年已有363件,集资403亿美元(陈介玄,2005)。

企业一旦能自主取得资金,对政策就只会选择性服从,企业主要考虑这些政策对企业自身是否有利。就公权力部门而言,当确保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金融条件不复存在后,产业政策的执行就可能发生扭曲,甚至变调。

以同属电子业的薄膜液晶显示器(TFT-LCD)产业为例,发展历程就与半导体产业大不相同。两者都是公权力部门重点扶植的对象,在台湾当局于2002年提出产业发展“两兆双星”的政策目标中,“两兆”指的就是期望半导体产业与影像显示器产业在2006年时产值都能突破一兆(一万亿)新台币。其

实早在 1988 年,官方的工研院就在推动 TFT-LCD 的相关研发计划。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台湾地区的 TFT-LCD 厂商开始量产时,生产的技术却非来自工研院,而是来自日本企业的技术转移。这些厂商认为,当局与其像以往般将研发经费集中到工研院,倒不如协助个别厂商自行研发。此时的工研院,非但不是半导体产业中的协助者,反倒成为这些厂商眼中研发经费补助的竞争者(潘美玲, 2008)。

当厂商手中已握有资金和技术时,公权力部门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应该从以往的带头主导,逐渐调整为协调与配合厂商的需要,适时地出台政策、采取行动,如此方能事半功倍地推动产业发展。如果公权力部门仍然延续旧时思维以政策主导产业走向,将因不易取得企业支持而使推动政策困难重重,终至延误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时机。

五、结 论

由本文所探讨的台湾地区发展经验可清楚看出,公权力部门要能有效推动产业政策,需要政治基础的支持与金融条件的配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台湾地区的威权体制能阻隔社会的干预,金融管制可确保资金的到位,因此国民党当局能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主导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政治民主化让利益团体有机会介入政策的制订过程,金融自由化使当局藉由融资确保政策有效性的能力下降,最终则是公权力部门主导产业发展的角色弱化。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当局的主导角色虽然减弱,但并非如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所言只要市场、不要政府,而是后者的角色需要调整和转型。公权力部门应从以往产业发展的主导者转变为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协调者,并视产业的发展需要配合出台政策、采取作为。公权力部门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维斯(Weiss, 2000)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评论的,“发展型国家正在转型,会不断调适、重组和创新,但就是不会消亡”^①。

进一步而言,公权力部门主导角色减弱其实有其积极、正面的意涵:这意味着以往的幼稚产业已发展茁壮并具有国际竞争力,标志着政府产业政策目标的最终完成以及产业政策自身的功成身退。合理地使用产业政策,可以帮助资源稀缺的后进国家或地区更有效地调度资源,推进产业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一味地迷恋产业政策的效果,固守公权力部门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导角色,则是错把手段当目的,一旦决策失误,造成大量资源的错误配置,反而会对产业与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参考文献

- [1] Cimoli M, Dosi G, Stiglitz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Dosi G, Cimoli M, Stiglitz J.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 Cheng T J.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J]. World Politics, 1989, 41(4).
- [3] Cheng T J. Guard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state as banker in Taiwan [A]. Haggard S, Lee C H, Maxfield S.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Johnson C.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5] Johnson 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 Deyo 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① 对东亚地区当前产业政策的评估,可参见: Fields K. Not a Piece: Developmental States, Industrial Policy, and Evolving Patterns of Capitalism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M]// Walter A, Zhang X. East Asian Capitalism: Divers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6] Skocpol T. .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A]. Evans P , Rueschemeyer D , Skocpol T.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7] Wade R. .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industrialization [M].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8] Weiss L. .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ransition: adapting , dismantling , innovating , not normalizing [J]. Pacific Review , 2000 , 13(1) .
- [9] Zysman J. . Governments , markets ,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M]. Ithaca ,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10] 陈介玄. 制度变迁与产业发展 - 从工业到金融体制之转型 [M]. 台中: 文笙出版公司 , 2005.
- [11] 段承璞等. 台湾战后经济 [M]. 台北: 人间出版社 , 1992.
- [12] 黄宗昊. 台湾政商关系的演变 - 历史制度论分析 [J]. 问题与研究(台湾) 2004 43(4) .
- [13] 李孟翰. 转变中的发展型国家 - 以台湾的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为例 [D]. 台中: 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 , 2003.
- [14] 潘美玲. 从经济奇迹到后进发展 - 台湾二十年来国家机器与产业发展 [A]. 王宏仁 , 李广均 , 龚宜君. 跨越 - 流动与坚持的台湾社会 [C]. 台北: 群学出版公司 , 2008.
- [15] [日]若林正文. 台湾 - 分裂国家与民主化 [M]. 台北: 月旦出版社 , 1994.
- [16] [日]谷蒲孝雄等. 台湾的工业化 - 国际加工基地的形成 [M]. 台北: 人间出版社 , 1992.
- [17] [日]隅谷三喜男等. 台湾之经济 - 典型 NIES 的成就与问题 [M]. 台北: 人间出版社 , 1993.

(责任编辑: 朱 颖)

(上接第 108 页)

环境因素与不考虑环境因素下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 , 在已有文献中 , 不同的研究者得到的结果不一致 , 所以结果不具备稳健性 , 这个问题也有待解决。可以看出 , 中韩之间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 但文中的测算方法仍未能精确测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文献

- [1] Nanere M. , Jain F. , Quazi A. , D Souza C. . 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85(2) : 350-362.
- [2] Repetto R. , Rothman D. , Faeth P. , Austin D. . H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ally Reduced Productivity Growth? Challenge (January - February) , 1997: 46-57.
- [3] Elsadig Musa Ahmed. The Impact of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Emissions on Malaysia's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 , 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07: 305-319.
- [4] 陈诗一.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研究 2009(4) .
- [5] 陈诗一. 中国的绿色工业革命: 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解释(1980 ~ 2008) . 经济研究 2010(11) .
- [6] 李小红 , 安庆贤. 环境管制成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世界经济 2012(12) .
- [7] 罗岚. 我国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贡献测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
- [8] 王兵 , 吴延瑞 , 颜鹏飞. 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OPEC 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2008(5) .

(责任编辑: 陈陶然)

Can informal sector affect Sino-African trad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gravity model*Liu Ailan Wang Zhixuan(94)*

In recent years , the impact of informal sector to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a new topic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urr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nformal sector hampered trade of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t present , Sino-Af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How can the informal sector , which domains African economic activities , impact Sino-African trade? This paper applies China's and 45 African countries' data from 2003 to 2012 and constructs a gravity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informal sector to Sino-African trad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trade in the short run ,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long run.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and Korea's Manufacturing Economy*Tian Na Myeong-Kee Chung(102)*

In this paper , we use input and output data from China and South Kore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study the tradition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extended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panel data model approach. The study found that , in the year 2001 ~ 2011 ,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verage TFP growth faster than Korea , hence TFP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manufacturing economic growth , but output growth of TFP contribution behind Korea. Comparing tradition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we found that China all industry average is the former than the latter , South Korea is smaller than the latter.

Industrial Policy and Finance: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s Development*Huang Zonghao Lin Gang(109)*

In the last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areas , public authorities often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industrial policy.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depends on political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literatures of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to find 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industry , finance and politics , and then explains how the government applies financial system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Before mid-1980s , Taiwan practiced authoritarian rule and financial control. The administration could eliminate interventions from society , introduce funds to planned industries , and guide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mid-1980s ,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unfolded in Taiwan. Commercial interests began to intervene in the policy process , and enterprises could obtain funds from diverse ways. These policies weakened capacity of public authorities in gui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and redefined their role as coordinator and cooperator.

Where does German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me from ?*Hu Dalong(117)*

German economy has been outperforming than other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European Debt Crisis.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is result?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trade and specialization pattern from 1990 to 2010 and identify whethe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erman manufacturing products is related to price or quality advantage by applying the unit value approach. In the meantime , this paper estimate the degree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of German export sector and calculate certain indicators for Germany , the Republic of Korea ,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role global value chains play in strengthening Germany's position in manufacturing.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Germany is specialized in medium-range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that quality is the main factor for Germany's succes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what's more R&D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maintain German competitiveness in manufactured products.